

存档 23 11

文史资料



9/1-6

第 一 期

224-29

(总第二十四期)

政协仪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征 求 意 见 稿

目

录

记杨国宇同志的俭朴生活.....陈尚金

少先队员林登富用石头打敌人.....马 哲

仪陇民主人士的榜样

——忆康济南同志的工作与生活.....吴玉书

记杨国宇同志的简朴生活

陈尚金

曾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有过卓越贡献的杨国宇同志（原名杨国玉），虽然荣任过海军总参谋长和副司令员等要职，享有崇高威望和荣誉，但他并不因此而居功自骄，在生活上依然保持俭朴节约的优良作风。

一九一六年，杨国宇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太平场红水滩（现大仪乡创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邦洪，终年给地主当长工，母亲陈氏，常年以纺棉花为业，节衣缩食供养四个孩子。长子杨国宇，次子杨国木，三子杨国平，四子名火平子。全家生活十分清苦。一九二八年，杨邦洪给地主抬滑杆被活活累死，那时杨国宇才十岁，刚从小学毕业。杨邦洪一死，留下母子五人，相依为命，艰苦度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贪官当道，肆意收刮民财，恶霸横行，无恶不作。弄得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一个孤身妇女，为养活几个孩子，不知流下多少眼泪，饱尝多少辛酸。杨国宇被迫辍学，二弟杨国木，三弟杨国平被迫给地主当利匠放牛谋生，四弟时仅六岁，以乞讨度日，被地主唆使恶狗活活咬死。母亲陈氏因此而气绝身亡。

杨国宇目睹惨状，潸然泪下，盼望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终于在一九三三年盼来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他的故乡——仪陇县太平场，赶走了豺狼，驱走了虎豹，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杨国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粉笔队里，同战友邓光汉等一起在交通要道、路口、墙壁书写大幅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写的标语，后虽遭围

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洗刷和日晒夜露，如今有的仍依稀可认。杨国宇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吃过树皮，嚼过皮带，什么艰辛和磨难都经历过，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崩溃的前夕，杨国宇随野战军解放了四川。当时，他三弟杨国平被国民党抓壮丁后，也驻防成都。成都解放时被擒。当他听到杨国宇的广播讲话“我是仪陇太平乡人，叫杨国宇……”时，心想，我哥叫杨国玉，莫非就是他？经过努力，终于见到了杨国宇。杨国平对身居要职的大哥报以很大的希望，盼望能给以支助，但出乎意料，杨国宇只留他住了一天，就派车将他送回了原籍，仅送一部手摇挂面机和一匹土白布，劝他回去好好生产，搞好家庭副业。二弟杨国术去北京探亲，希望哥哥给予照顾，结果和杨国平一样，只给了一部挂面机和他穿过的一件旧军大衣和一双大头鞋，并教育他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发展生产。

杨国宇同志事事从自己做起，不搞特殊。带客也不过是稀饭馒头而已，一粒饭，一片菜都不允许随便浪费。杨国平曾回忆说：“那年我到北京海军学院去探望大哥，得到嫂嫂姚新的热情接待。她破例买回排骨红烧。吃饭时，我象在家中一样，把排骨吃了就扔在地板上，也没在意自己掉在桌子上的饭粒。出乎意料的是大哥将扔了的排骨和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一块一块、一粒一粒的捡了起来。他一边捡一边说：‘可惜！可惜！’他虽没有^直接教训我，但却羞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一九六三年，杨国宇同志来信说，他将于近期返乡探亲。他的两

个弟弟兴高平烈，到处借家具装饰家庭。区、乡政府也积极准备接待，还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以保证杨国宇同志的安全。结果也出乎人们意料。当杨国宇从仪陇县乘车到观紫区时，仅有区武装部长和他的警卫二人护送。到了太平乡与先锋乡分路的公路口，还叫警卫和区武装部长随车回去，自己则随来接的乡武装部长及亲兄弟，步行十余华里来到他弟弟家。当他走进太平乡（原太平场）顺利大队（原响水滩）的界区时，看到民兵站岗放哨，当即就叫乡武装部长立即全部撤去。离他弟弟家仅一华里时，又叫乡武装部长也返回，不得护送。他的两个胞弟，为自己的哥哥离家达四十多年才重返故乡亲人团聚，热情自不必说，早已备妥鸡、鸭、鱼、肉和乡政府特别照顾给的五十斤大米。杨国宇同志看到这些时说：“生活不能搞特殊，不准请客，不准接受礼物。”吃饭时他只吃稀饭、鲜小菜，在兄弟、侄儿的再三劝请下，才喝了一点鸡汤。他食量很小，每餐不超过一两粮，饭后就走家户，与父老乡亲交谈，了解乡亲们生活，还用解放前后对比来教育乡亲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他离开家乡返北京的头一天，他的堂兄侄儿们再三请求和他聚会一次，他才同意安排一锅干饭和白菜豆腐汤接待。亲人送来的鸡蛋、白糖一律谢绝不收，各赠给一条四寸见方的小手巾以作纪念。他走的那一天，步行到太平乡时，乡政府早准备好筵席招待，鸡、鸭、鱼、肉样样齐备，他只看了一眼说：“承蒙大家盛情，吃不饱，吃不下。”随后就到了区公所，同样的盛筵，一样地谢绝。

他的堂侄孙女杨慧，多次要求去北京，本想找个比较舒适的工作，但结果让她给他的女儿当保姆，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杨慧她无

不感动地说：“想不到大爷生活如此俭朴，真是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榜样。”

杨国宇同志身为军队高级将领，在枪林弹雨中，戎马生活几十年，可谓功高而位显，但他从不谋求个人名利，平时自己节衣缩食，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一九五七年大仪乡（原太平场）修大仪水库，杨国宇同志从弟弟信中知道后，即捐赠人民币1000元。这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前辈的高尚品质，不愧为后世楷模。

少先队员林登富用石头打敌人

与 哲

一九三四年一月，仪陇县少先队指挥都指挥长林登富奉命指挥少先队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六日，他带领少先队一个中队，配合红军反攻“六路围攻”。尽管队员们只有大刀长矛，但人人士气旺盛，个个有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决心。他们一路跑步前进，先于敌军占领了福新镇寨坝和天星寨。

天星寨山高林密，三面是陡崖，另一面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寨坝，地势十分险要。少先队进驻山寨后，林登富观察了地形，他们用居高临下更有利条件，带领队员在山上修工事，挖战壕，在寨门内堆放了许多乱石。他向队员们说：“敌军来进攻的时候，等靠近了才打，大家听我的命令，喊打才准打。”

敌罗泽州部在红军痛击后，仍想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当他们发现天星寨只有少先队员把守时，便集中优势兵力，把天星寨团团围了起来。用大炮、重机枪疯狂攻击，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寨门附近。少

先队员隐蔽在寨门附近的战壕里老是不作声，也不还击。敌军不知虚实，凭借他们的优势火力掩护，疯狂地向山寨冲来，一百米、五十米，敌人离少先队的阵地越来越近，少先队员们紧握石头严阵以待，当敌军刚爬到寨门附近时，林登富一声令下，少先队员们喊着杀声，乱石像冰雹骤雨一样砸向敌人，石块乒乒乓乓往敌群滚去，犹如山崩地裂一样，敌军猝不及防，当场砸伤十多人，砸死数名，敌兵喊爹叫娘滚下坡去。敌军又组织了几次冲锋，均未得逞。林登富带领少先队员们顽强的战斗，一直坚持到中共仪陇县委共祝傅崇碧同志率增援部队一排红军，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上下夹击合围，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步枪十余支，迫击炮二门。这一重大胜利，给苏区青少年以很大鼓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共川陕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第卅四期，于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坚决斗争”的专栏内，以《仪陇少先队用石打死棒老二》为题，对林登富等人的英雄事迹作了报道：“仪陇县少先队指挥部指挥长林登富同志，带领少先队一排人驻扎大星寨，被敌人围着，他们用石头拼命的斗争，打死敌人数名。同时少共县委在收索（搜索）阵地时，与敌人作一决死的战争，缴获敌人钢枪十余支，迫击炮两挺（门）。同志们加紧学习军事来与我们比赛，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仪陇少年先锋队在指挥长林登富的带领下工作十分活跃。那时，到处都可听到他们的歌声、操练声、读书声。当时他们常唱着：“小朋友，要注意，团结地主不是个好东西，一天不劳动，专门干坏事，我们的粮食全被他夺去，小朋友，快联合，猛个石头打破他脑袋，打破就打破，不留一个，到了那时候，我们才快活。”广大少先队员正是在这些假

慨激昂，斗争目标鲜明的歌词鼓舞下英勇打击敌人的。林登富率队用石打敌人的事迹见报后，对川陕省各地少年儿童组织开展对敌斗争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反敌“六路围攻”斗争的开展。

注：文中引用的少共川陕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第三十四期，“坚决斗争”专栏内《仪陇少先队用石头打死棒老二》原文内的标点和括号内的字系编者所加。

仪陇民主人士的榜样

——忆康济南同志的工作与生活

吴玉书

康济南（1896—1972年），字洪刚，仪陇县观音河（今三河乡）人。幼读私塾，后考入川北保宁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在保师毕业后，任川军二十九军中校团副，因失将离职，回家乡小学教书。

1924年在南充住旅馆时与赴仪陇县上任的县知事陶梦云为房间铺位发生争执，返县后惧县官恶势，被迫逃往成都。留蓉期间，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思想倾向革命。1949年4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9月受成都民盟组织派遣，回仪陇县进行军事联络、迎接解放等工作。返县后，他积极支助中共仪陇县地方党组织成员戴天德、唐子明、胡崇德等人的革命活动，多次劝我县中上层分子李光、李章南等人的稳定工作。12月23日仪陇解放，此时仪陇解放委员会成立，康任副主任委员兼治安组长。对于保存和整理地方武装，维护社会安定、开展清匪和支前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50年1月18日，仪陇县人民政府成立，康济南被选为仪陇县

建设科第一任科长。以后他还先后担任过：仪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仪陇县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法庭委员、仪陇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仪陇县电力公司经理等职。

1951年秋，我当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县文联（川北区文学艺术联合会议陇分会）调县人民政府工作，与康济南时有接触。1953年8月被调到县电力公司任副经理，就经常和他在一起工作了，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至今难以忘怀。

刚解放时的建设科要主管农、林、气、邮电、工交和城市建设等工作，当时干部缺乏，人少事多，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开展工作，困难确实很多。康济南同志身兼数职，他不仅要处理很多具体的工作问题，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这对于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同志来说，的确是十分繁忙和紧张的。这里我把感受最深的一些事记述下来，以资借鉴。

解放初期仪陇县城开大会无礼堂。1950年秋，县委决定修^{大礼堂}工程，总面积为500平方米，16米跨度，中间无柱。这是我县解放后第一大修缮工程。当时县上无设计人员，康济南请来县内蔡一致等能工巧匠，画了草图，取得县委、县府同意后，决定在县城东南面的城墙边（现电影院处）推去一段城墙，作为修礼堂的地址。他一边请人平整地基，一边派人去兴隆场买回大批木料，经县上决定又组织人力去^{（今双庆乡）}大平^{（今双庆乡）}撤除双庆寺庙宇的全部材料运到县城。在施工中，正逢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来我县视察工作，看了设计图纸，他向康说：“这是解放后仪陇县的第一大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么大的跨度，无柱子是否有问题？”

康很重视秦副主任的意见。重新找设计人员研究，修改了图纸，决定在16米跨度两端的2米处，各加一根75公分的砖柱，跨度减少为12米。经过近一年的日夜操劳，大礼堂于1951年秋竣工。从此县上开大会、作报告或开展文娱活动有场所了。这座礼堂1963年划归县电影管理站使用，1984年改建为仪陇电影院。

1951年2月，川北地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杨超邦同志来仪陇视察。他看到县城机关和居民夜间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便向县委书记周慎说：“我拨10万斤大米给你们修一座小型电厂，供县城照明用电。”县委、县府领导当即决定成立仪陇县电力公司筹备委员会，由郭宪书县长任主任委员，康济南任副主任委员，并抽调县政府秘书唐子明参加筹备工作。当时仪陇县绝大多数人没看见过电灯，怎么办电厂呢？首先要找到懂电的技术人员，恰好，川北行署交通厅工程师陈君模到仪陇商讨修南部到巴中这段公路和修建仪陇到马鞍山公路问题，康济南便向他打听办电厂的技术人员。陈想了一下说：“我在重庆中唐房街的兰际毅可以承担这项任务。”康高兴地对郭县长作了汇报，郭即派唐子明持陈君模的信和县政府的介绍前往重庆。唐到重庆找到了兰际毅，并在兰的帮助下购买了所需机器和材料，又请到了电工蒲海福、铁炉工姜坤碧，办电厂的主要问题得到了解决。土建部分，康济南把修大礼堂的全部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李弼超、罗清调去修电厂，所余的全部材料也拨给建修电厂厂房用。同时，组织民工修通了县城到杨家桥电厂的2公里可通汽车的便道，使发电机器、器材顺利运到工地。为了永久纪念这一工程，康济南请示县领导同意，镌刻了“仪陇县新工业建设第一基石”

的石碑，并将这块石碑安砌在厂房正面（靠公路边）的墙壁上。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952年春试车发电了。县人民政府购买了第一套广播器材，在县城安装了有线广播。这年春节电灯照全城，喇叭唱欢歌，县城特别热闹，日兴、土门，甚至马鞍、新寺（永乐）都有人专程到县城参观。但由于锅炉产汽不足，蒸汽机出力不够，一直不能正常发电，于是康派人去重庆找原厂赔偿损失。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私营重庆马宝贵铁工厂和洪发利机器厂同意给锅炉另加蒸汽包和赔一台80马力的船用立式双缸蒸汽机。又因我县无修理安装人员，康又派人去南部电厂请来潘金荣作技术指导，潘来仪后发现仪陇没有会飞、铲合的钳工，经潘的推荐，又请来了姜麟书、李文信等人。1954年春节新安装的发电机投产了，从此县城照用用电得到了解决。

仪陇县城历来缺水，1949年县城周围只有29口水井，日产水1700多挑。当时县城有常驻人口3500多人，每人每天不足半挑，一遇天旱，人平半挑也不能保证。因饮水奇缺，常常引起一些纠纷。县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决定拨款打井，解决县城人民生活用水，这项任务自然落到建设科长康济南同志的身上。他从营山请来了有找水、打井经验的老人，并亲自带领他们查看了县城周围的地形，选定了打井位置。由于县城地理位置所限和打井技术落后，所打的井产水很少，有的还无水，但毕竟缓和了县城供水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解决县城人民饮水的困难，他四处奔波，找有关技术人员请教，特别是电力公司技术员潘金荣建议用机器抽水使他很受启发，立即将这一建议向县委书记周慎、县长舒宪书作了汇报，受到县委、县府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当即决定在电力

公司建自来水站，由康济南和我具体组织实施。1954年，他派我去重庆采购高压水泵和2寸水管及其它有关材料。我在四川省重工业厅第一办事处的协助下，从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791厂购买了一批外径为2寸的无缝钢管和外径为3寸的镀锌铁管，并立即将这一情况信告康济南同志，不几天收到他的回信，肯定了我的努力和克服两难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外径2寸的水管不合使用，应购内径2寸的水管，要我退货另购合格水管，他知道退货困难，在信中他劝道：“有米为炊，何贵巧妇？”这句话使我昼夜难眠。我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反其意而用，就是说如无困难，派一名副经理去干什么？我只有下决心克服两难，说服卖方，把外径为2寸的无缝钢管退了，另购了合格的水管。单级扬程251米的高压水泵，据重庆办事处的技术人员说，这种水泵，不仅重庆买不到，恐怕这时全国也难买到。我回县汇报了这一情况，康济南接连几天在电力公司找潘金荣、兰荫绶等研究办法，最后决定采纳潘金荣的意见，自行设计制造三缸活塞式高扬程水泵。当时电力公司修理车间技术力量薄弱，设备也及简陋，只有数吨的土化铁炉一座，一台5尺轻型皮带车床和一部台钻。要制造一台重一吨多铸件，最大的重200多公斤，且加工程序复杂的高扬程水泵，困难之大可以想见。康济南常同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测量管线、架设水管、修建水池、制造和安装高压水泵、建立供水站配套设施等一系列工程顺利竣工了，于1955年秋正式试车抽水，几经^折测试车，终于将潘家河的水抽上了金城正梁，县委、县府领导都亲自到场祝贺。以后县上开大会也曾多次组织

到会人员参观抽水。把潘家河的水引上 251 米高的金城山腰，这在解放初期确属一件奇闻壮举，参观者无不惊叹，也无不感激康济南等干部和参与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辛勤劳动。

解放初期仪陇县交通十分不便，县城到各区、乡均是羊肠小道。

1951 年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乡村道路，这个任务又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建设科。康济南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区乡，动员民工十多万个搞民工俭勤，整修了立山到悦来（今柳）、立山到二龙（今大寅）等区际间道路及一些重点乡村道路，共 10 多条，大大方便了行人和物质的往返运输。1954 年初，县政府决定修建县城到日兴的 9 公里公路。当时一无测设人员，二无测量仪器，康济南组织民间石工和有测量知识的干部，利用水平尺、角尺和皮尺，自制了荆竹标杆，一段一段的测出高程、坡度、距离及转弯半径，先后测出由县城经莫家湾、电光大队到日兴，经潘家桥或王家桥到日兴的三条线，进行分析、比较，他考虑到电厂在潘家桥，将来工厂可能办在潘家桥一带，所以决定公路经潘家桥到日兴。

事实证明，他当时是有远见的，如今潘家桥一带已成了农机厂、酒厂、印刷厂、色织布厂、啤酒厂、塑料加工厂等，成了仪陇县城的工业区。这条公路要架两座桥，当时缺乏水泥、钢筋，他便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用石墩和三公寸见方的柏木作桥梁，中间打斜撑，经过艰苦努力修起了潘家桥和平溪桥，可使载重 4 吨的货车通过。这两座桥直到 60 年代才分别改建为石拱桥和钢筋混凝土平桥。1955 年 12 月，县人民政府又决定修建仪陇县城到马鞍的公路，经过一年的努力，仪马公路 1956 年底竣工。我县乡村道路的整修和公路建设的开建，康济南同志是花了很

大心血。我们一直不能忘记他做出的贡献。

康济南同志敢于大胆用人，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长处。1950年，他把当时在全城小学当总务的李福魁（系国民党投诚人员，曾任傅作义部的军部少校作战参谋，在全城小学工作踏实、能干，县上开大会每次都把他抽去当总务管后勤）要来参加管理修建大礼堂，后又调他去经修电厂，多次派他去西部、重庆办事，每次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时有人提意见说：“康济南重用坏人。”康曾对我说：“来自旧社会的人那能没有缺点，共产党的政策不是既往不咎吗？只要他现在不干坏事，还是可以用其所长的。”李福魁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但他总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我县的经济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事。1981年政协仪陇县委员会成立，县委安排李福魁任政协常委，1984年5月10日病逝。还有潘金荣，他曾任上海当电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开办电器行，人称“小潘”，是重庆有名的小资本家，解放初期在川北行署工业厅工作，1952年在南部电站修机器，当时仪陇的发电机运转不正常，许多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康济南把潘请到仪陇，给予优厚的待遇，1952年9月川北行署撤销，合并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从此把潘长期留在仪陇。他工作积极，为仪陇的电力建设、自来水工程和机械工业的发展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58年南充地委书记戈润生到仪陇县检查工作，发现仪陇水厂用单级水泵把河水送上251米高的金城山脚，他深有感触地说：“有了这样的水泵，何愁嘉陵江水不上山！”他听说是潘金荣设计的，检查工作结束离仪时他便把潘带往嘉陵江沿江两岸查看建设水电站的位置，后来把潘留在了南充地区。潘先

在南充第二电机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到南充地区水电局担任工程师。

康济南同志非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当时电厂无宿舍，他租用了电厂附近的民房安排好工人的家属，电厂管理人员都住在车间内，逢年过节康都主动去慰问工人，并叫工厂伙食科备办酒席招待工人。他曾对人说：“办厂要靠工人，要靠技术，管理人员要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虽然兼多职，工作忙，但总是挤时间，经常去工厂和工人交谈。他平易近人，对工人讲知心话，因此工人对他也十分随便，都把他当作知心人，无话不说，有时间还同他开玩笑。他说话很风趣，常常引起工人们哈哈大笑。厂里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意见和要求他都常向县委、县府领导汇报，县委书记、县长也常到厂里去看望、慰问工人，对干部作风深入，党群关系密切，党内外同志合作共事，关系融洽。1954年春新安装时80马力蒸汽机试车，康济南把县长郭光书、县财经委员会主任唐文楷请到发电厂，蒸汽和汗水湿透了工人的衣服，也打湿了县领导和康的鞋袜，他们随同达旦和工人战斗在一起，直到试车成功。休息时工人们上街坐茶馆，康也经常抽空与工人一道在茶馆里饮茶聊天，有人向县委书记周慎反映：“电厂工人上街坐茶馆，康科长有时也陪同，太不成话。”可用书记说：“工人上街不坐茶馆，在那里休息？”这件事不久被工人知道了，大家都非常感激县委领导对工人的关怀和体谅。1954年仪陇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他建议：“工人中应有人大代表。”县委采纳了他的意见，技术工人兰际绥当选为仪陇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康济南担任仪陇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各代会）副主席时，积极组织各界人士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各界人士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参加各项运动，如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他除认真搞好本职工作外，在推进仪陇工商、文教、农业、优抚、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宣传贯彻《婚姻法》等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广泛联系各方面人士，如民主人士刘化民、老教师马瘦，老石工李华亭、养路工陈光元、青年干部许约先等都是他经常联系的好友。

1951年初仪陇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康济南担任抗美援朝仪陇县分会副主席，在动员各界人士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动员群众捐款捐粮购买“朱德故乡号”战斗机的捐款活动中，在组织群众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示威游行和和平签名运动中，他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又善于团结各界人士，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1956年县人民政府换届选举时，当选为仪陇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

1956年秋，县委决定康济南、刘化民去重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政治学校学习。有次因公出差去重庆，专程去学校看望他们，康济南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提出‘一化三改造’将要很快实现，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也发表了，今后全国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县技术力量缺乏，我想能不能成立一个技术研究会，提高青年职工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当时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他学习结束返县后，又把这个意见向县上有关领导汇报了。不幸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人说他在重庆把北京反党集团“章（乃器）罗（隆基）联盟”的黑线牵回了仪陇，并在仪陇组织技术研究会这个“反动组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长期遭受不白之冤，调县文化馆工作，1960年退休回农村，1972年病故，终年76岁，1979年9月平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补发了抚恤金，对家属子女均按政策作了妥善安置。

康济南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仪陇经济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为解决县城人民饮水和照明用电作出了显著贡献，为仪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作中，他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和批评意见，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一道工作，在党外各界人士中有很大大影响，是仪陇民主人士的榜样。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的亲见亲闻，记述生动具体，是当今干部作风建设的好教材。康济南同志在仪陇还做了不少有益于仪陇经济建设的好事，如修建仪陇中学、县川剧团，修筑刘寿川先生墓等，望知情诸君积极撰稿，以补本篇之不足。